

从考古发现看青海道与丝绸之路

张延清

(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横穿柴达木盆地的青海道是古代先民流动、迁徙的重要通道,特别是南北朝时期,成为东西方物质交流和文化传播的主要孔道。吐蕃进入这一地区后,青海道仍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传播和商贸交往的重要通道,青海都兰和郭里木出土的丝绸、金银器和棺板画等,有力地证明,吐蕃在吸收丝路文明的同时,为丝路文明的建构和传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丝绸之路 青海道 考古发现

中图分类号: K9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0) 03-0104-13

近年来,青海湖周边的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早在汉晋时期,青藏高原就与域外世界进行着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及至吐蕃进入青海湖周边地区后,青海道成为吐蕃融入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本文将要讨论的青海道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在古代世界,来自欧亚草原、地中海以东的先进文明,源源不断地穿越青藏高原及其周边,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华夏文明进行互动,使封闭的青藏高原,紧跟世界文明的节拍。

一、青海都兰的考古发现

柴达木盆地自远古以来就是人类迁徙流动的通道,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线,魏晋南北朝期间曾一度成为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位于柴达木盆地的青海都兰,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唐代吐蕃墓葬群,其中经过正式发掘的有热水乡扎马日村血渭草场墓地和夏日哈乡河北村大什角沟墓地两处。

1982-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县对一批唐代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主持发掘的许新国认为这批丝绸“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图

收稿日期: 2019-07-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藏阿里后弘期初的佛教遗存与多民族交融研究”(19ZDA177); 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张延清 (1969-), 男, 藏族, 甘肃天祝人。副教授, 主要从事古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案之美，技艺之精，时间跨度之大，均属罕见”^①。据许新国统计，都兰出土的这批丝绸中，“共有残片 350 余件，不重复图案的品种达 130 余种。其中 112 种为中原汉地织造，占品种总数的 86%；18 种为西方中亚、西亚所织造，占品种总数的 14%。”^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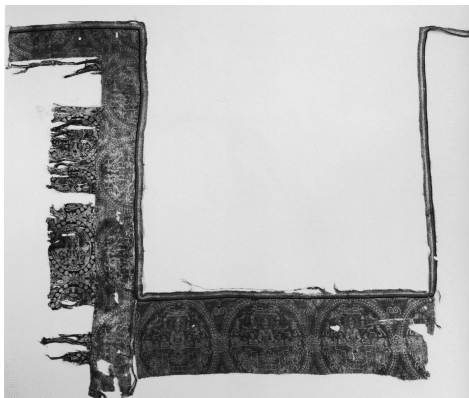


图 1 都兰出土凹形锦幡残片
(采自《丝织品考古新发现》，第 74 页)



图 2 都兰出土太阳神织锦云珠吉昌太阳神套环
(采自《丝织品考古新发现》，第 76 页)

1. 红地簇五^③云珠吉昌太阳神锦 都兰出土丝绸中，红地簇五云珠吉昌太阳神锦很有特色，此锦融汇了东西方多种文化元素。此织锦的三件残片被缝缀在一件凹形锦幡残片（图 1）中，锦幡残片由红地云珠太阳神锦（图 2、3）、小窠联珠对马纹锦（图 4）两种图案组成，其中的簇五太阳神锦，色彩保存极佳。整个图案由外层卷云和内层联珠组合成圈构成簇五骨架，经向的五个套环连接处用兽面铺首作纽，而在纬向的套环连接处则用八瓣小花作纽。该锦全幅应由三个套环连接而成（图 5），居中作为母题纹样的是太阳神锦，上下两端分别是对称的两个相同狩猎、搏击题材的套环。太阳神套环为一组六匹翼马拉车的组合像，其中太阳神身穿尖领窄袖紧身上衣，头戴宝冠，手结定印，交脚端坐于覆莲座上，面相庄严、安祥，有联珠纹头光，上有华盖；华盖顶端有两条飞龙向左右两侧呈飞驰状，姿态矫健；华盖两侧各垂一团流苏。车驾两侧各有一略向内弯的树枝，上挂龙首幡迎风招展。



图 3 都兰出土太阳神织锦狩猎套环
(采自《丝织品考古新发现》，第 76 页)

① 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0 年第 15 期，第 63-81 页。另见赵丰主编《丝织品考古新发现》，香港：艺纱堂，2002 年，第 73 页。

② 赵丰主编《丝织品考古新发现》，第 73 页。

③ 许新国和赵丰在上引《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丝织品考古新发现》等文中均作“簇四”，但根据笔者观察，尽管图 1 中太阳神图案只有 4 环，但与之相连的狩猎、搏击套环却有 5 个，而两种图案是一一对应的，所以应是“簇五”才符合实情。



图4 都兰出土联珠对马纹锦
(采自《丝织品考古新发现》，第75页)

太阳神左右两侧各有一半身像卫士，头戴圆顶帽，肩扛两叉戟，面向太阳神，神情庄重威武，应为护卫。太阳神宝座靠背后方左右两侧各有一半身人像，头戴中国式幞头，面向前方，神情专注，似为驾车者。太阳神所乘四轮车驾由六匹带翼神马驮负，分左右两组背向奋力向前。整幅图案左右对称分布，动态十足。经向套环连接铺首上方为对称的云纹，上有一倒写的汉文“吉”字，“吉”字上方两侧各有一动物，呈相向奔跑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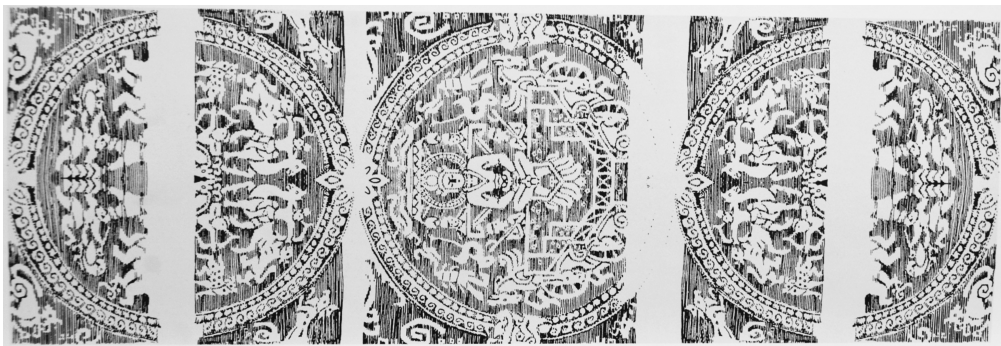


图5 都兰出土太阳神织锦线描图
(采自《丝织品考古新发现》，第76页)

狩猎、搏击套环中分上下共有四组纹样，从上而下，第一组为武士骑驼射虎图，两战驼奋蹄相向而行，两圆帽武士回首张弓搭箭射向前爪奋起飞扑而来的狮子；第二组为骑马猎鹿图，两匹马相向而驰，两武士回首张弓射向花斑鹿，受惊的花斑鹿边奔跑边回首张望。由于织锦已残，第二组图案下半部残缺，马蹄、鹿蹄及武士腿部缺失；第三组图案上半部已残，从下半部推断，是对人对兽，很可能是两个相向而行的武士回首搏狮；第四组图案是两个武士相向奔袭而来，一手持盾在前作防护状，另一手奋力挥剑在后作搏击状，两武士身后各有一站立鸚鵡回首而视，鸚鵡前上方各有一灵芝图案。狩猎、搏击套环整幅画面有张有弛，动静相宜，生动逼真。套环经向连接花纽上方为对称云气纹，上有一汉文“昌”字，“昌”字上方两侧为背向回首而驰的奔鹿图案，花纽下方为对称的云气纹，其下为一对相向而立作回首状的对狮，对狮中间有七个圆点。

2. 黄地卷云太阳神锦 织锦同上引云珠吉昌太阳神锦类似，全幅由三个套环上下连接（图6、8），套环间以小花作纽，居中为母题纹样太阳神车驾，上下两端套环纹样相同，且对称。居中母题纹样为一组四匹翼马拉车的组合像（图7），其中太阳神身穿尖领窄袖紧身上衣，手结定印，双腿叉开，双脚跟紧靠，有头光，上有华盖，华盖上似为飞龙，两侧各垂一团流苏；太阳神两侧各有一武士，各骑一鸟状物，双手举弯曲状两

叉戟，相向侍立于太阳神两侧。太阳神套环上下两端的纹样相同的套环内，图案分四组（图6、8），上端第一组为对象，第二组为骑马猎鹿图，两匹马相向而驰，两武士回首张弓射鹿，受惊的鹿边奔跑边回首张望；第三组为对狮图案，两只狮子相向昂首而立，各举起一前爪；第四组为对骑驼图，两武士骑双峰驼相向而行，双驼各有一前蹄抬起，作昂首嘶鸣状，双驼后各有一忍冬纹样；太阳神套环和其下套环连接花纽两侧有对马衔花图案和忍冬纹；太阳神套环和其上套环连接花纽两侧，饰有形象模糊的对兽纹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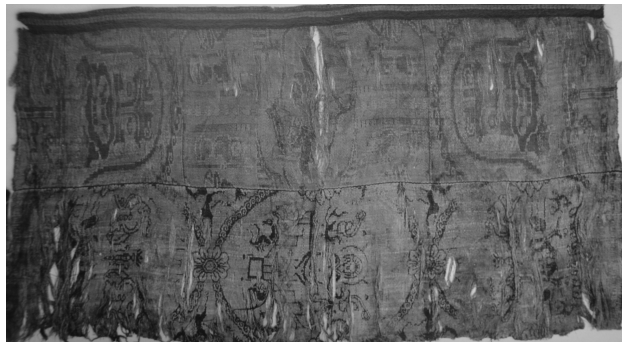


图6 都兰出土黄地卷云太阳神锦
(采自《丝织品考古新发现》，第78页)



图7 都兰出土黄地卷云太阳神锦套环
(采自《丝织品考古新发现》，第8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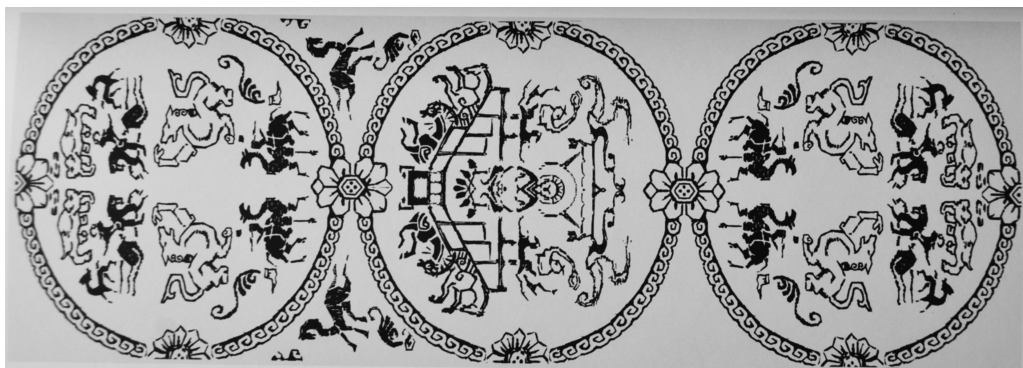


图8 都兰出土黄地卷云太阳神锦线描图
(采自《丝织品考古新发现》，第76页)

3. 红地瓣窠含绶鸟锦 此图案是赵丰先生利用十余件都兰出土织锦残片拼合复原而来（图9、10）。图案中心呈椭圆形，团窠外环以八片半圆形花瓣，团窠内为一鸟立于一方台上，方台侧立面饰以横向联珠纹。立鸟腹部羽毛呈鱼鳞状，尾部呈板刷状，翅带弯钩向上卷起，翅膀由横向条带和斜线网格组成，中间饰以竖向联珠条带；立鸟颈部饰以联珠圈，鸟喙衔联珠纹折叠状绶带，绶带折弯处下垂三串珠串，每串两颗珠子，绶带两头末端带结，从立鸟脑后平行伸出。瓣窠图案四角饰以十字形宾花，中心为一方框，内有八瓣小团花，方框外四向各伸出一花朵，上有花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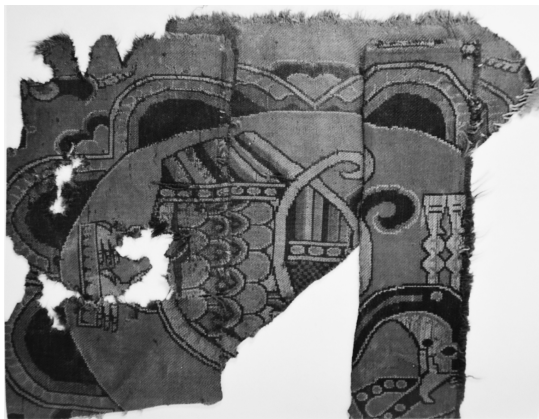


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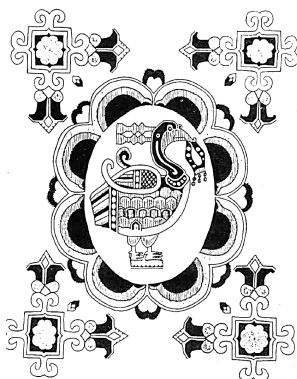


图 10

(图 9 都兰出土红地瓣窠含绶鸟锦复原图, 采自《丝织品考古新发现》, 第 88 页;
图 10 都兰出土红地瓣窠含绶鸟锦示意图, 采自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藏学》1996 年第 1 期, 第 72 页)

4. 黄地瓣窠灵鹫纹锦 图案(图 11、12)中心为一圆环, 环外有八瓣半圆形花瓣, 花瓣边缘饰以联珠, 环内是一正面直立的灵鹫, 头侧向左, 带头光, 双翅平展, 翅膀上部及颈部饰以联珠纹, 神鸟有尾羽七根, 腹部为一正面人形图案, 双臂向两侧弯曲状伸出, 双脚呈“一”字形。



图 11 都兰出土黄地瓣窠灵鹫纹锦

(采自《丝织品考古新发现》, 第 9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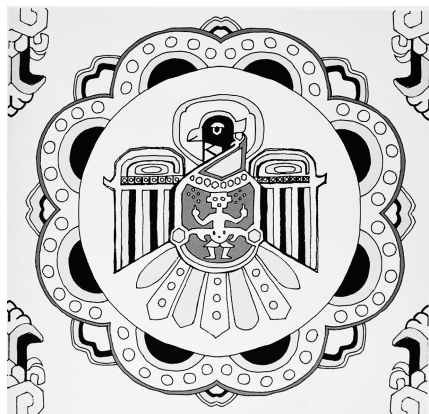


图 12 都兰出土黄地瓣窠灵鹫纹锦线描图

(采自《丝织品考古新发现》, 第 93 页)

5. 红地团窠联珠对含绶鸟纹小孩上衣 此件衣物系美国芝加哥某私人收藏家收藏的一件唐代小孩衣物(图 13), 衣物的质地上为织锦, 下为绵布, 织锦上的图案为团窠联珠对鸟纹, 团窠内为对含绶鸟, 两两相对, 共同衔着一连珠绶带, 站立于棕榈叶基座上; 对鸟颈部饰以联珠圈, 脑后各平伸出一条带结绶带; 对鸟翅带弯钩向上卷起, 鸟腹部各有两朵团花, 尾部呈板刷状, 尾部和翅膀饰以竖向联珠条带; 相邻四个团窠间饰以十字形宾花, 中心为一十字, 四向各伸出一花朵, 上有花蕾。此件衣物的样式是对襟式的唐装。与

此件衣物相似的另一件小孩衣物（图 14）现藏于美国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中，据研究认为均系吐蕃时代的遗物。这两件小孩衣物均具有相同的时代特点与样式风格，可能均与唐代吐蕃人的织物制作有关。如这一推测无误，则反映出吐蕃人一方面喜爱来自西方中亚一带的纹饰风格，但在衣服的式样上却吸收了来自东方大唐的式样，堪称为“东西合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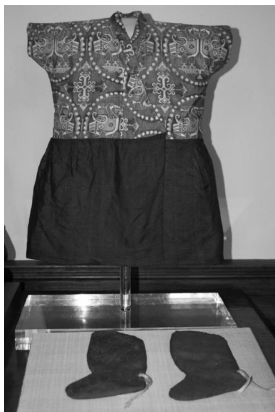


图 13



图 14

（图 13 芝加哥私人收藏小孩衣物、图 14 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粟特丝绸上衣，均采自霍巍《一批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 年第 5 期，第 34 页）

6. 婆罗钵文字锦 标本号为 DRXM1PM2: S161 的婆罗钵文字锦是一件缝合成套状的织锦，图案为一行连续桃形条带纹样，边缘饰以连珠纹，织锦之上还织入了婆罗钵文字（图 15）。

北大教授林梅村先生，转寄德国哥廷根大学中亚文字专家马坎基（D·NMacKenzie）教授作了研究和鉴定。经他确定，这是波斯萨珊朝所使用的婆罗钵文字，拉丁字母转写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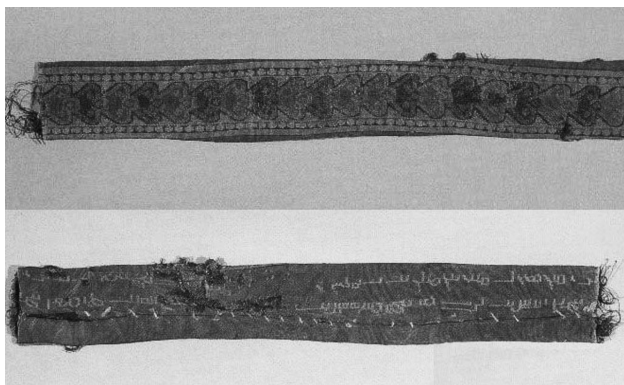


图 15 都兰出土波罗钵文字锦

（采自《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第 266 页）

第一行：MLKanMLKA = SahanSah “王中之王”

第二行：LBAGOH = Wuzurgxwarrah “伟大的，光荣的”。

公元 7 世纪，萨珊波斯（224-651）一朝覆亡。许多波斯王室成员流亡唐朝，血渭一号大墓出土波斯织锦，显然是这些波斯难民带入中国的。这件织锦的另一半流散在海

外，上面有波斯王的名字，本为波斯王室所有。织锦年代在公元七世纪。^①

除了上引纹样外，都兰出土丝织品中还有团窠联珠对牛纹锦、对羊纹锦以及对波狮龙凤纹锦等多种精美图案。

如上所述，都兰地处丝绸之路重要支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丝路不畅，由吐谷浑控制的丝绸之路都兰支线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东西方文明在此交流碰撞，这集中体现在都兰出土的这批丝绸纹样上。都兰出土丝绸的一大特点，是结合了东西方众多艺术样式，成为古代世界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以上引都兰出土太阳神锦为例，太阳神神话在古代东西方均有流传，北欧早在新石器时代奥涅加湖的岩画中，出现了带有辐射光束的圆和半圆形图案，被认为是日、月神话的反映，这种“绘有光束的圆和半圆，是日、月的象征”^②。及至青铜时代，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特伦霍尔姆，发现了挽以骏马的青铜车，上载日盘；瑞典布胡斯伦之岩画中，有车轮负载之光盘，而在西班牙的特鲁埃尔，发现了蹄下、背上均有日轮的青铜驹，表明青铜时代，欧洲确有太阳神崇拜。^③

希腊早期神话中的太阳神叫赫利俄斯，传说他是提坦巨神许伯利翁及其妹兼妻子忒伊亚的儿子，传说中他每日乘四马金车从东到西在空中巡游，晨出昏没，给世间带来光明。^④希腊艺术东传，在阿富汗巴米扬 K155 东大佛天顶上的太阳神形象，亦是四驾马车，有卫士驾车，太阳神衣着中亚风格的服装，身后有背光，代表太阳，此崖刻图像融合了希腊、萨珊波斯、印度等地文化元素，带有明显的犍陀罗风格。

我国古代神话，羲和每日驾六龙所牵车驾载着太阳神在空中巡游，《淮南子·天文训》载：“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⑤《初学记》引用了《淮南子·天文训》作：“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⑥并在其后作注：“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泉，羲和至此而回六螭。”^⑦

云珠吉昌太阳神锦很明显是来自中国的织锦，来自西方的神话传说、印度的佛教内容及犍陀罗的艺术样式在中国被完美地揉合在一起，以新的纹样出现在织锦上，畅销于丝绸之路。在新纹样中，太阳神以手结定印、带头光、交脚坐于莲座上的弥勒菩萨的形式出现，太阳神一跃变成了佛教中的菩萨。按照西方的艺术样式，太阳神一般由四马所驾，如上引黄地卷云太阳神锦（图 6、7）中，太阳神为四匹翼马所挽，而中国神话故事中的太阳神是六龙所挽车驾所载，所以按中国的传统，西方的四驾马车在中国变成了六驾，尽管织锦上挽车的是翼马，而非中国传统的龙，但翼马数量带上了东方特色，而

① 参见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6页注17。

② [苏]谢·亚·托卡列夫著，魏庆征译《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7页。

③ [苏]谢·亚·托卡列夫著，魏庆征译《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第39页。

④ 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14-115页。

⑤ [汉]刘安著，陈广忠译注《淮南子译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4页。

⑥ [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页。

⑦ [唐]徐坚等著《初学记》，第5页。

且在太阳神华盖上织入了飞龙，再加两侧的龙首幡及汉字“吉”、“昌”等元素，有意识地增加了东方太阳神的色彩，而纹样中的拉车翼马及联珠纹等符号又带上了波斯的烙印。许新国先生在对以上两种织锦作了深入分析后认为“这是中国内地制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像……这种图像经过了本土优秀艺术观念的洗炼，融合了中国内地文化因素之后，又传播到了青藏高原的柴达木盆地。”^①

二、青海郭里木的考古发现

2002年8月初，青海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德令哈市郭里木乡的古墓遭盗掘，立即上报，青海省考古研究所随即组织考古人员赶赴当地与海西州民族博物馆人员一道对已遭盗掘、地处德令哈市巴音河南岸郭里木乡的两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②。两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形制，其中一座墓为男女合葬木椁墓，另一座为迁葬墓；迁葬墓是先将逝者骨架装于一小棺内，而后再将小棺再装入大棺中；两座墓内的金银器等随葬品已被盗掘一空，仅剩一些丝绸残片、木鸟、木马鞍和漆矢服等。三具木棺四面均有彩绘，其中木棺前后档板绘有四神及花鸟图，棺侧板则绘有贵族射猎、宴饮、丧葬图。

1. 四神图 四神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与“四象”紧密相连，我国古代把二十八宿分作四组，每组七宿，并将各组七宿组成的图案想像为四种动物形象，分别为龙、鸟、虎和龟蛇。经不断演绎，又将四神与东、南、西、北四方联系起来，《三辅黄图》记载：“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③在后来发展中，又将四方与青、朱、白、黑四种颜色联系，构成东宫青龙，北宫玄武，西宫白虎，南宫朱雀。^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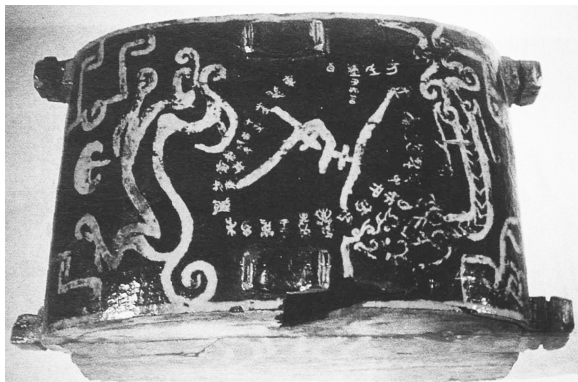


图16 曾侯乙墓出土彩绘髹漆二十八宿天文图木箱
(采自《曾侯乙墓》，彩图10)

四神图是中国传统的墓葬装饰图案，早在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衣箱箱盖上就出现了青龙白虎图案（图16），及至汉代，朱雀、玄武等图案成了墓葬题材的重要内容。1957年在陕西绥德出土东汉竖长方形墓室石门上，减地雕刻展翅翘尾的朱雀立

① 许新国《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太阳神图案织锦考》，《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第80页。

② 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版画》（上），《柴达木开发研究》2004年第2期，第30-31页；《郭里木吐蕃墓葬棺版画》（下），《柴达木开发研究》2005年第1期，第30-32页。

③ 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

④ 谭维四著《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55页。

于兽面铺首之上，铺首左侧为一奔腾向上的青龙（图17），显示出汉代艺术质朴、雄健的时代特征。^①此石门现藏于陕西碑林博物馆。

1951年，陕西绥德县思家沟快华岭东汉墓出土石门上雕刻有完整的四神图案（图18）。墓室门楣、门框阴线刻规则精致几何纹图案，两门框下刻玄武，相向而立，两扇门扉上部对称刻一展翅欲飞的朱雀，两朱雀足踏铺首衔环，衔环下左扉刻一扬尾奋爪，张口作咆哮状的白虎，衔环下右扉刻一昂首飞驰的青龙。整幅雕刻显得雄奇严整，森严肃穆。



图 17



图 18



图 19

（图17 东汉朱雀、铺首、青龙门扇，图18 陕西绥德东汉墓门四神图，图19 唐李寿墓石刻四神图，分别采自《陕西古代石刻艺术》，第20、29、71页）

唐代墓葬中，四神更加流行，如唐初李寿墓石槨上雕有四神图。墓门左右门扉以减地平雕手法，在门扉上雕有三排联珠纹，将图案分为上、下两层。上层雕刻有一对朱雀，相对而立，凤冠高耸，长尾上扬，展翅欲飞；下层也雕有一对长尾翘起，相对而立的孔雀，造型简练，线条流畅，姿态优美（图19）。李寿墓石槨壁上还雕有青龙（图20）、玄武（图21）等神兽，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图 20 唐李寿墓石刻青龙图



图 21 唐李寿墓石刻四神图

（采自《陕西古代石刻艺术》，第68页）

^① 李域铮《陕西古代石刻艺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20页。

及至唐中、后期，四神图被绘在了墓道壁画上，如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紧随出行图、客使图、仪仗图之后为青龙图，西壁马毼图、客使图、仪仗图后为白虎图。陕西咸阳发掘的中唐苏君墓在墓道东壁南端绘一青龙，脱落严重，仅残留一踏卷云纹的龙爪，西壁南端绘一白虎（图 22），全身披黑色卷毛，四爪强劲有力，呈疾走状。^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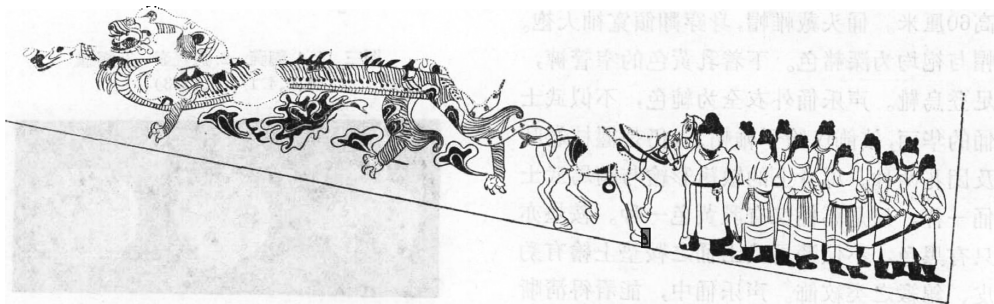


图 22 苏君墓墓道白虎线描图（采自《陕西咸阳唐苏君墓发掘》，第 496 页）

处在丝绸之路要冲，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都兰，墓葬中也出现了四神图，四神被绘在了木棺棺板上（图 23），其中青龙、白虎被绘在了团窠联珠纹内（图 23-1），四神图形与联珠结合的这种东西合璧的艺术样式，早在初唐李寿墓中就已出现，玄武图中的蛇龟造型与李寿墓中所刻玄武非常相似，只是李寿墓中的龟甲非常清晰，而郭里木棺板画中龟身全部用绿底黑点（图 23-2）。棺板画四神图中的辅助纹样如云气、莲花和繁复的忍冬等不见于唐墓中，体现出了吐蕃工匠的匠心独运及西域特色。



图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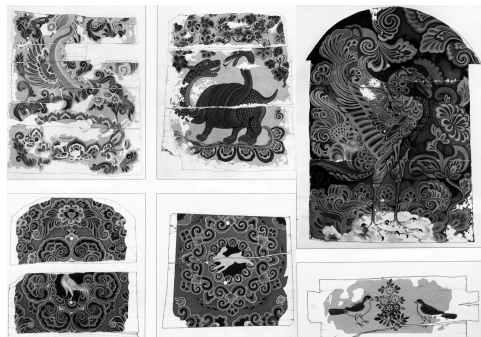


图 23-2

（图 23-1 青海郭里木吐蕃墓出土木棺板画上的四神图，霍巍先生提供；图 23-2 青海郭里木吐蕃墓出土木棺板画上的四神图，采自《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西藏（中文版）》2005 年第 1 期，封三）

2. 商旅图 郭里木棺板画的内容，除了四神图外，还有一些画面集中反映逝者生前狩猎、宴客、及去世后的丧葬仪式。作为商旅图（图 24）也是棺板画的主要内容之一，被绘在一片棺板的中心部位，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贸易繁荣的缩影。棺板左侧的中部画一支满载货物的驼队，驼前三骑，驼后一骑，前后相继。人物缠头，着圆领或翻领

^①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唐苏君墓发掘》，《考古》1963 年第 9 期，第 496 页。

长袍，束腰佩带箭囊。商队中间是一满载货物的骆驼，成匹的丝调整齐捆缚在驼背上。面向驼队有二位袖手躬腰的人物，他们立于帐前迎候这支商队的到来，帐内是一对举杯对饮的夫妇，只见男子高缠头，着翻领长袍，女子发带珠饰，头披巾，穿翻领衣。



图 24 郭里木棺板画中的商旅图

(采自《中国国家地理》2006 第 3 期，第 89-90 页)

3. 青海吐蕃金银器 2001 年下半年和 2002 年上半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西宁征集到一批都兰吐蕃墓葬的盗掘文物，共 35 件。其中动物造型的银器 20 件。^①

1) 卷毛狮俑(图 25-1) 狮呈平卧状，狮身先是用捶揲法打造出器身两半，凸出造型，然后焊合在长方形银板上；狮身四肢、头部及背部均凸出明显，头部有细线条刻出忍冬纹花结，劲部有凸出的下垂鬃毛，背部有突起的卷毛结 7 个，毛结两侧是对称的鬃毛纹向左右两侧展开；狮尾向右侧上卷，狮身上鑲有三瓣小花作装饰。

2) 翼马俑(图 25-2) 为一奔马急停造型，马前腿蹬直，后腿略屈，尽力使身体后仰、急停，因惊恐马眼突出，张大嘴巴作嘶鸣状，马尾略上卷复下垂卷起，呈 S 型。造型夸张，生动顽皮。整个器形先捶揲出两半，再焊合为一体，其中马耳、马尾、马四蹄均为分别打造后焊接在马身上。马身两侧用细阴线刻出翅膀，显示出翼马的形象。



图 25-1



图 25-2



图 25-3



图 25-4

(采自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的动物形银器》，第 68-69 页)

3) 立鹿俑(图 25-3) 整个器形也是先捶揲出两半，再焊合为一体，其中角、耳、腿、尾均为分别打造，再焊接至鹿身。鹿头、鹿身均用卷曲状细阴线刻出卷毛纹样。

^①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的动物形银器》，《中国西藏（中文版）》2003 年第 1 期，第 66-72 页。关于这批动物形银器，林梅村先生认为很有可能是郭里木吐蕃墓葬出土物，因为这批银器在市场上出现的时间恰在郭里木吐蕃墓葬被盗掘前，因此林梅村认为“这批具有皇家艺术风格的动物形银器不一定出自都兰大墓，更可能出自郭里木发现的吐蕃大墓”，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第 273 页。

4) 卧鹿俑(图 25-4) 整个器形也是先捶揲出两半,再焊合为一体,其中角、耳、腿、尾均为分别打造,再焊接至鹿身。鹿头、鹿身均用卷曲状细阴线刻出卷毛纹样。

以上动物形银器中的狮俑和翼马,很明显是来自波斯的艺术样式,而立鹿俑与毗伽可汗宝藏中的鎏金银鹿(图 26)非常相似。七世纪兴起的突厥汗国曾一度称雄漠北,734 年,东突厥毗伽可汗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部下毒死,毗伽可汗宝藏中的立鹿“属于国王一级的皇家艺术品”^①,它的制作年代与青海吐蕃金银器中的立鹿很接近。而与卧鹿俑相似的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卧鹿(图 27),鄂尔多斯卧鹿的制作年代是战国时期。可见丝绸之路上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自古就未曾中断过。



图 26 毗伽可汗宝藏中的鎏金银鹿



图 27 鄂尔多斯青铜鹿

(均采自林梅村《毗伽可汗宝藏与中世纪草原艺术》,《上海文博论丛》2005 年第 1 期,第 71 页)

吐蕃与周边文明联系紧密,对金银器的加工尤为擅长。早在松赞干布向唐朝请婚时,就献上了金银器,《旧唐书》记载:

因复请婚,太宗许之。弄赞乃遣其相禄东赞致礼,献金五千两,自余宝玩数百事。^②

书中所载“自余宝玩”很可能就有吐蕃工匠加工的金银器。文成公主入藏后,唐太宗伐辽东还朝,松赞干布派使者献上金鹅:

太宗伐辽东还,遣禄东赞来贺。奉表曰:“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而高丽恃远,阙于臣礼。天子自领百万,度辽致讨,隳城陷阵,指日凯旋。夷狄才闻陛下发驾,少进之间,已闻归国。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预子婿,喜百常夷。夫鹅,犹雁也,故作金鹅奉献。”其鹅黄金铸成,其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③

松赞干布驾崩后,由其孙芒松芒赞继承,因年幼,政权仍由大相禄东赞继续摄理,

①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第 273 页。

②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 196《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221 页。

③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 196《吐蕃传上》,第 5222 页。

于显庆三年（658）派使者赴唐都长安为幼主请婚：

显庆三年，献金盃、金颇罗等，复请昏。^①

玄宗开元十七年，唐蕃又起战端，唐朔方大总管信安王祗率兵攻克吐蕃石堡城，并于石堡城置振武军，吐蕃遣使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乘机进言，历数通和之便。皇甫惟明奏曰：

开元之初，赞普幼稚，岂能如此。必是在边军将务邀一时之功，伪作此书，激怒陛下。两国既斗，兴师动众，因利乘便，公行隐盗，伪作功状，以希勋爵，所损钜万，何益国家。今河西、陇右，百姓疲竭，事皆由此。若陛下遣使往视金城公主，因与赞普面约通和，令其稽颡称臣，永息边境，此永代安人之道也。^②

玄宗采纳皇甫惟明的奏章，派遣皇甫惟明和内侍张元方充使往问吐蕃。惟明、元方等至吐蕃，拜见了赞普墀德祖赞和金城公主，传达了玄宗息战言和的旨意，赞普墀德祖赞欣然请和，将贞观以来两家往来书信全部拿出示于惟明等，并派遣曾赴长安迎娶金城公主的吐蕃重臣名悉腊随惟明等入朝，呈献“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以充国礼，为传达吐蕃通和的殷切期望，金城公主“又别进金鸭盘盞杂器物等”^③。这次进献方物，《新唐书》也有记载：

明年（735），上宝器数百具，制冶诡殊，诏置提象门示群臣。^④

从以上记载看出，时隔八十多年后吐蕃进献的金银器更加丰富，精巧。都兰古墓出土的金银器，很可能就是吐蕃在吸收异域元素的基础上，由本土工匠打造。

综上所述，尽管雪山高耸，气候严酷，道路凶险，但青藏高原是东亚、中亚和南亚的结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流动迁徙的通道。河谷地带、山间孔道成了东西方物质交流和文化传播的线路。正如童恩正先生所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悠久文明，中亚草原的游牧文化，西亚河谷的农业传统，南亚热带沃土上孕育出来的思想意识，均曾汇集于这一号称世界屋脊的高原之上，使这一地区的历史，在本身固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性质；并且在不同时代由于感受的外来影响有所不同，风格亦迥然相异。从文化上来说，西藏可以说是亚洲古文明的荟萃之所。”^⑤

①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 216 上《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075 页。

②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 196 上《吐蕃传上》，第 5230 页。

③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 196 上《吐蕃传上》，第 5231 页。

④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 216 上《吐蕃传上》，第 6085 页。

⑤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 年第 9 期，第 9-19 页。